



華崗傳

向
陽

浙江人民出版社

向
阳

★
華
崗
傳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 1 号

书名题字：宋 平

华 岗 传
向 阳 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6万 印数 1—13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908-7/K·240 定 价：7.50元



1953年华岗在青岛

120353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李维汉等在上海吴铁城分馆与国民党及第三方面人士举行非正式会谈时的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华岗、李璜。后排左起：胡政之、陈家康、陈启天、蒋匀田、邵力子、罗隆基、吴铁城、李维汉、左舜生。



1952年在山东大学上政治大课！

序 言

林默涵

我跟华岗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但在年龄上他比我大十来岁。我和他接触较多是解放战争中在香港那一段时期。当时我在香港担任党组织创办的《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华岗是《群众》周刊的创办人之一。我们要他写稿，记得他用林石父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他又参加中共香港工委的工作。香港工委是直接受党中央领导的。他除担任工委的工作之外，还进行研究工作，写了好几本书。那时在香港出版书并不容易，特别是革命的书。香港有个海燕书店，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他要我给他出些主意，我给他订了一个出书计划。海燕书店本是专出文艺书籍的，我建议也可以出些广大青年需要的社会科学书籍，这样我就介绍“海燕”的经理去认识华岗。我告诉他华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著作很多。后来华岗的好几本书都是在“海燕”出版的。解放后我只在北京见到华岗一次，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们相见甚欢。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1955年他由于受到政治诬陷，被关进监牢长达17年，以至病死在山东的监狱里。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清除了那些对华岗的诬陷之词，对他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扫除了污泥浊水，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认为华岗同志具有如下高尚的革命品德：

第一，华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实践家，他一生都在进行革命实际工作。他是早期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年轻时就担任过党的许多负责工作，地区的，直到中央部门的。后来又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比如对龙云和四川的一些军人，对许多上层民主人士他都做过工作。同时他也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像闻一多、李公朴这些知名人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说我们党有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可以说，华岗除了没有参加武装斗争，他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他积极参加了党的宣传工作，早年就编过党的刊物，主编过《列宁青年》，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可以说，华岗既是学问家又是革命实践家，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实践家。

第二，华岗是杰出的学者和理论家。他研究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哲学，晚年又研究美学。他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并且都取得了成就。这些成果应由专家去评价，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他的研究工作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比如他研究历史是因为只有透彻地了解历史，才能够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吸取历史的教训，从而坚定地站在历史先进力量方面，推动历史前进，创造新的历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立即收集资料，写了《中国大革命史》，这是现在唯一的一本研究大革命史的专门著作。写这么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这次大革命的失败，从许多战士的流血牺牲中总结经验教训，使革命继续前进。华岗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要实际服务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他不是单纯地实践或单纯地研究，而是把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华岗的又一特点。他的信条是：“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马克思的战友们曾这样评论过马克思，说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第三，华岗是一个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一个人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时候参加革命比较容易，在革命形势艰难险恶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华岗就是在革命形势艰难险恶的时候，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敌人的残酷折磨没有使他屈服，后来被送到“反省院”，他又顶住了“反省院”里的种种欺压威逼，始终不屈不挠地坚守共产党人的忠贞气节。由于受到党内一些人的误解、诬陷，1955—1972年他被监禁长达17年之久，而他对党的信念始终不变，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信不疑。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还尽一切可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美学等等，写出了许多著作。这一切，没有坚定的信念和至死不渝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可贵的是，华岗同志这几个重要的特点，在向阳同志写的《华岗传》中得到了体现。

《华岗传》的问世，对所有曾经和华岗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人来说，是一种慰藉和怀念。但更有意义的，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了解华岗的一生，并能从中得到感受和启迪。一个革命者同时又是学者，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为了革命的信念投身战斗。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是面对残酷的敌人还是被自己人误解、受冤屈，他对党的事业信誓旦旦，至死不渝。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真正的战士。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永远尊敬的！

华 岗 述 评

——向阳著《华岗传》序言

廖盖隆

华岗(1903.6.9—1972.5.17)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毕生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不息。然而他走过的路是坎坷不平的，并在他生活后期蒙受了极大冤屈。从1924年他参加革命起到1972年他去世止的48年中，有几乎一半即23年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6年坐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监狱，有17年坐的竟是自己的党——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监狱，并冤死狱中。华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历史时期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头6年在高等教育岗位上的重大贡献，将永远记载在历史上；他留下的《中国大革命史》、《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以及他在冤狱中写成的哲学著作《美学论要》、《规律论》等总共有几百万字的论著，将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应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要求，以向前辈学习的诚挚态度，校读了华岗的学生、向阳副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写成的《华岗传》，并且不揣浅陋，写出以下一大篇有关华岗生平的话，作为这本书的序言，以就正于史学界才俊和广大读者。

向阳著《华岗传》的优点是：资料丰富翔实，有引人入胜的

叙述；有历史背景的介绍，而主要是叙述了传主的生平事业和思想；在事业和思想两方面，更注重思想理论的分析，但也记载了他在开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和组织推动人民民主运动方面的重大功绩；对传主在关键时刻的果断行动和远见卓识，对他的勇于坚持真理，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并帮助他们进步，在治学上既勤奋、严谨，又勇于探索、创新这些优良品质和作风，都作了事实确凿、形象生动的描绘。总之，《华岗传》是一部既有思想深度，又真实感人的好传记。我从中得到了许多教益和启迪。

现在我想大致上循着《华岗传》的叙述顺序，对华岗的生平事业和思想，作一个简要的述评。它也许会对读者能提要钩玄地阅读《华岗传》多少有些帮助。

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中成长

华岗出生于浙江龙游县一个农民的家庭。辛亥革命后，那里的农村兴办了小学。华岗于1914年11岁时入初小读书，在那里，他从思想进步的老师的讲课中，开始知道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欺凌，中国人民要立志救国的道理。两年后即1916年他考入高小，开始养成爱读书刊、爱写作文和日记的习惯。约在1920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入衢州浙江省第八师范学校学习。这时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起，以民主、科学和民族救亡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和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发生的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群众运动浪潮，正在席卷全国。华岗积极学习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新思想，并勇敢地投入衢州八师的学生爱国运动。他受到激进的民主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924年2月，他在共产党人杨贤江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支持所谓学生从事政治运动“要不染党派色彩”，而应是每个人单独地“爽爽快快奋勇直前，向我们的敌人扑去”的错误意见。同年5月，恽代英撰写《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一文

答复华岗和另一个青年若兰，循循善诱地向他们说明，正是为了革命，为了打倒军阀，就要组织成为强固的有纪律的革命政党。华岗很快就纠正了“不染党派色彩”的糊涂观点。1924年2月后，华岗从衢州八师转入由国民党左派人士经亨颐任校长的宁波浙江省第四中学校学习。就在这时，华岗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团宁波地委宣传部负责人(1924年7月到1925年8月)。他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宁波社会科学研究会；不久，他同革命青年汪子望一起主编党领导的《火曜》周刊(1925年3月创刊，8月被迫停刊)，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积极参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全国革命高潮，在宁波地区激起了巨大浪潮，22岁的华岗就是宁波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骨干和领导人之一。这年8月，《火曜》周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华岗也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宁波四中开除。1925年8月，青年团中央委派华岗为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岗就是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浪潮中作为一个“弄潮”青年而锻炼成长的。

1926年5—6月间，华岗被调到上海担任沪西团委书记。不久，转任团江浙区委宣传部长，往来于上海、杭州、南京之间指导团的工作和革命群众运动。

编著《大革命史》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华岗于1927年8月被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兼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1928年2月他奉调到天津担任团顺直省委书记。两个月后即返回上海经东北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他参加了六大的宣传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农民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中共六大闭幕后，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五大。团五大选出了关向应(书记)、李求实、李子芬(组织部长)、华少

峰(即华岗、宣传部长)等组成的团中央委员会。华岗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和少共国际五大。1928年9月底10月初他回到国内,向青年团传达中共六大和团五大的精神,并筹办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半月刊。他在《列宁青年》上撰文宣传六大和团五大的路线,批判改良主义,并撰文赞扬朱毛红军。1930年夏,华岗被调离团中央,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从此他专做党的工作。这年8月,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成立长江局,并与湖北省委合并,成立总行委,他是7名总行委委员之一。李立三“左”倾路线被纠正之后,总行委成员被调回上海。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

就在这时,他病了,休息了几个月。他利用养病的时间,完成了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和中央一些负责人的文章及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编著成的《中国大革命史》一书的定稿工作。根据青年史学工作者王学勤的核对,这部书一半多一点是辑录上述文件、文章的内容而编写成的。这部书于1930年3月编成初稿于1930年底到1931年初修改补充定稿,1931年7月在鲁迅帮助下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尽管编著者对材料来源未作说明是一个缺点,但这部书的编成出版,仍然对开拓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帮助革命者研究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巨大作用。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时和其后一年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工农共达31—32万人,华岗编写《大革命史》首先是为了纪念这30多万烈士以及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的成千上万烈士。他在《自序》中说:“我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的战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革命史》确实为这些革命烈士树立了一座丰碑。华岗编写《大革命史》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帮助革命的人民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学到许多“历史辩证法的教训。”

列宁在1905年1月写的《革命的日子》一文中说：“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现代历史，并力求使我们的描写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取得最大最持久的结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华岗编著的《中国大革命史》，他后来撰写的《五四运动史》以及他在抗日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数以百万字计的政论，在这方面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

1931年1月比李立三更“左”的得到苏联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的王明上台后，约在1931年5月，华岗恢复了中央组织局宣传部的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组织和领导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的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反蒋抗日的文章。此后不久，华岗作为中央巡视员被派到北方工作

六年牢狱中的斗争

1932年9月，他被中共中央委任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他到任前特委书记由魏抱一代理。他化名刘少陵在前往东北途经青岛时被逮捕。但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刑讯逼供，他仍然坚持自己是一个皮货商人，名叫刘少陵。他先后被监禁在济南看守所和武汉反省分院达6年之久。他在狱中先后遇到了他先前认识或了解的共产党员任作民和向明(巨任吾)，他们在一起商量如何向狱中的难友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多次领导他们进行反对非法虐待、反对克扣伙食的斗争。华岗向难友们说，革命者在狱中的任务，一是保健，二是学习。华岗在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国内外时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还挑选了可靠的进步青年14人办学习班，华岗向他们系统地讲授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课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中国共产

党的代表董必武到了汉口。华岗通过当时在武汉做地下党工作的冯乃超，把他自己化名刘少陵被关押在武汉反省分院的情况报告了董必武。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共产党员华岗(即刘少陵)和任作民出狱。这年10月16日，他俩胜利出狱了。

创办《新华日报》，受到王明打击

华岗出狱后即被任命为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迁重庆后改名南方局)机关报刊《新华日报》总编辑和《群众》周刊编辑。华岗随即全力投入编辑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工作。他懂得党的历史，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识渊博，而且待人坦诚，作风民主，因而能团结从各方面调集来(包括从巴黎《救国时报》调来)的同志们一道工作，把《新华日报》办成在国统区出版的共产党的真正党报，又是能反映国统区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呼声的真正人民报纸。中共中央在《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的1939年1月11日致这个报社(这时报社已迁到重庆)的贺电中称赞说：“一年来《新华日报》正确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坦白地反映了全中国同胞的意志，坚定地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忠实地执行了“坚决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责任”。这个成绩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潘梓年为社长、华岗为总编辑的报馆全体人员共同努力取得的。

然而1938年11月王明的回国和随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却不断地干扰和损害了《新华日报》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从莫斯科回国，下车伊始就攻击党中央执行的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和领导

权的正确路线，而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即一切经过蒋介石)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一切服从蒋介石)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到武汉后就叫嚷：“我要用欧洲的经验来抓宣传工作。”《新华日报》创刊的第二天，即1938年1月12日，他就在《团结抗战》的社论中，提出“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1月20日，他在《关于游击战争》的社论中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极端轻视，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进行的正规战争。他说：“游击战只能成为正规战的一种辅助战术，游击队及游击战争本身，都不能进行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欲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正规战争方能歼灭敌人，赶走日寇。”1月29日，他又发表《关于建立新军队》的社论，提出“建立新军队的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补给、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就是说，他要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溶入国民党军队。王明还在《新华日报》上不时刊登《王明启事》、《陈绍禹启事》。华岗指斥他这是为个人登政治广告。特别可贵的是，据石西民回忆，华岗早在1938年初就对他说：“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华岗的这些批评和意见，招致了王明的极度忌恨。于是王明对华岗在《新华日报》的工作，百般挑剔和指责，并强行组织对华岗的批判会，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直批判到华岗吐血昏倒为止。王明进而在实际上剥夺了华岗的《新华日报》总编辑实权。1938年5月下旬，华岗被派到东南战场采访。6月下旬华岗返回武汉，随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活跃在东南战场上的新四军》。他断言，我们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把我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

接着，临近武汉失守时，长江局又派华岗赴重庆筹办《新华

日报》。这次华岗又胜利完成了任务。重庆《新华日报》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新华日报》出最后一期的同一天即开始出版，因而做到《新华日报》一天都没有间断。

《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出版的初期，华岗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抽出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比如，他撰文警告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英国，提出他们采取纵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政策，必然导致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浩劫中去。他的预见后来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1939年1月，在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蒋介石顽固派也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新华日报》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文件和报社的许多文章被禁止发表。报社人员千方百计地为反对反动派的压迫、为冲破它的限制而斗争。1939年5月重庆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后，国民党当局强令重庆各报由《中央日报》把持出联合报，这实际上是等于使《新华日报》和其他报纸停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一面联合各中间派报纸要求国民党当局允许各报复刊，一面组织一部分力量出版油印的《新华日报》墙报，在全市大街小巷张贴，发生了很大宣传教育作用，国民党当局终于被迫让各报于8月13日复刊。

病中著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 《社会发展史纲》

1939年夏，华岗又病了，而且遭到王明的进一步排斥和打击。王明以“违抗领导”为借口免去华岗的《新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并且不给他分配另外的工作。蔡馥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愤慨地说：“王明是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出名的”，“他对久经考验、有学问、有阶级斗争经验、有组织能力的华西园（即华岗）同志不是当作珍宝来使用，而是视为眼中钉，想把西园同志的总编

辑地位由他的秘书来代替。”“在许多同志不知底细的情况下，把华西园同志调开”，“而且不另分配他工作，这是完全违背我党一贯干部政策的。”华岗离开《新华日报》馆后，到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办公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了一间房子，“专心写书，靠自己的稿费生活”。

然而王明虽然可以利用权势免去华岗的领导职务，却禁止不了他以写作论文、专著，弘扬真理的方法来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作贡献。在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的时间内，正如向阳所说，是“华岗病中著述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近100万字的论著。除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以外，大都是史学论著，其中主要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等论文，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卷和大革命卷）、《社会发展史纲》等专著。特别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约40万字）一书，虽然如同华岗自己所说：“写作时间短促，以致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不免有些草率。许多待考的史料一时都不及考证”，但是此书一出版，就在全中国广受欢迎，数年间就印刷8次之多，起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蒙作用。他的另一本专著《社会发展史纲》，出版后也大受欢迎。这是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百分之百的教条主义者王明打击迫害华岗的失败。

争取刘文辉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围歼新四军军部近万人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坚决揭露和谴责了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鉴于形势异常严重复杂，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一方面要力争时局好转，为此就要加强争取中间派包括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要紧急疏散一大批干部，精简机关。南方局书记周恩来